

摘 要

儿童话语是《新青年》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青年》扮演了儿童解放的“宣传者”与“引领者”角色，真正实现了“为儿童”的呼吁，从理论与实际重新认识儿童，在教育理念、生存环境、精神需求，以及儿童文学等方面完成了针对传统儿童观的重建。论文以《新青年》中出现的儿童话语为研究对象，从儿童的发现、对传统儿童观的重新建构以及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第一章，儿童的发现。《新青年》从“人的发现”到“儿童的发现”，引领了解放潮流，使人们认识到了儿童的重要性，把儿童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

第二章，对传统儿童观的重新建构。传统儿童观中儿童是成人的附庸，是国家的奴隶，没有自己的独立可言。《新青年》从儿童教育理念的阐释，儿童生存环境的提倡以及精神发展的需求方面，对传统儿童观进行了重构，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三章，《新青年》与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通过对《新青年》中的儿童文学作品进行分类研究与分析，梳理出为成人的儿童文学与为儿童的儿童文学，阐释了儿童文学现代观念的产生与发展。

关键词：《新青年》；儿童话语；发现；儿童观；儿童文学

ABSTRACT

Children's discours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ew Youth". "New Youth" plays the role of "propagandist" and "leader" of children's liberation, truly realizing the appeal of "for children", re-understanding children from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 living environment, spiritual needs,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views on children has been completed. The dissertation takes the children's discourse in "New Youth"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nalyzes it from three aspects: the discovery of childre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children, an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 first chapter, the discovery of children. From "discovery of man" to "discovery of children", "New Youth" leads the trend of liberation, makes people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children, and treat children as a complete person.

The second chapter i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children. In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children, children are the vassals of adults, the slaves of the state, and have no independence of their own. "New Youth" reconstructs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children in terms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ldren's educational concepts, the promotion of children's living environment and the needs of spiritual development, and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he third chapter, "New Youth" an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Through the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New Youth", the children's literature for adults and the children's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are sorted out, and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ncept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re explained.

Key Words: <New youth>; Children's discourse; Discover; Children's view;
Child literature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绪 论.....	1
第一节 选题缘起.....	1
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	2
一、关于儿童的发现.....	2
二、对儿童教育理念的阐释.....	4
三、儿童文学.....	7
第三节 研究意义与方法.....	12
第一章 儿童的发现.....	13
第一节 儿童作为“人”的被发现.....	13
第二节 儿童作为“儿童”的被重视.....	15
第三节 《新青年》之于“儿童发现”的意义.....	18
第二章 对传统儿童观的重新建构.....	21
第一节 教育理念的重新阐释.....	21
一、西方教育理念的引进.....	21
二、具体问题的讨论.....	23
第二节 对生存环境的再认识.....	26
一、国家（社会）.....	27
二、家庭.....	29
第三节 对儿童精神发展的关注.....	32
第三章 《新青年》与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	36
第一节 为成人的儿童文学.....	36
一、关注弱者.....	37
二、反映现实.....	38
第二节 为儿童的儿童文学.....	40

一、天真的儿童	41
二、《卖火柴的女儿》	42
第三节 儿童文学观念的现代性	44
结 语	47
参考文献	48
致 谢	53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54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

把儿童当作“儿童”，而不是“小大人”，这样的认识是从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世界图解》开始的，迈开了人类重新了解儿童的第一步。随后，洛克、卢梭、裴斯泰洛齐等都提出了尊重儿童的观点。进入二十世纪，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提出著名的“儿童中心主义”，对传统的儿童观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二十世纪初杜威来华演讲，宣传以“儿童本位论”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儿童观，加快了认识儿童的步伐。日本在欧洲新思潮的影响下掀起了“儿童学”热潮，曾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周作人等受到了此潮流的影响，回国后致力于儿童学的译介与倡导，推动了中国儿童的“发现”进程。

传统中国社会，人们的观念被异化的儒家伦理道德禁锢，不把儿童看作和成人一样的人，儿童没有作为人的权利，更别谈尊严。在西方“自由”、“人权”思想冲击下，19世纪末的中国儿童开始受到重视，但只是作为“国民”的一分子而存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利用《新青年》呼吁民主和科学，从政治、文化、思想、艺术等方面对封建思想进行猛烈抨击。《新青年》编辑部广泛征集有关妇女和儿童的稿件，扮演了儿童解放的“宣传者”与“引领者”的角色。在刊行期间，中国处于思想观念的大变革时代，平等挑战尊卑，自由冲击束缚，儿童地位的变化，社会对儿童的要求、希冀、看法与评价在刊物中都有迹可循。作为领军人物，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都关注过儿童问题：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周作人《人的文学》指出“祖先为子孙而生存”，这是顺应自然而产生的，在《儿童的文学》中，进一步倡导儿童应有适合自己的文学，使中国儿童文学开始进行自觉地转变；胡适在《归国杂感》中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提出小学教学办学要注重课程的实用性，不能只注重课程的完备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们的思想对于提高中国儿童的社会地位和儿童观的现代性转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本文以《新青年》中的儿童话语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儿童观直接反映了人们对儿童的态度和看法,研究《新青年》中的儿童话语,有利于切实把握儿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地位与生存状态,明白《新青年》的努力为儿童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二是《新青年》真正实现了“为儿童”,从呼吁重新认识儿童,到儿童文学观念的产生,都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儿童观的形成。

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

从1915年9月《青年杂志》(一年后改为《新青年》)创办算起,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学术界对《新青年》的研究硕果累累。为掌握《新青年》中儿童话语的研究进展,笔者在“读秀”、“中国知网”等网站,以“五四儿童话语”、“儿童的发现”、“《新青年》儿童”、“儿童观”、“儿童文学”等为关键词进行搜索,选择相关度较高的文章与专著,对其中内容进行分类概述。

一、关于儿童的发现

对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研究,大多集中于“儿童本位论”,多从宏观角度研究儿童观的发展过程,把五四时期提出的“儿童本位论”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来论述。王浩《新文化运动中的“儿童的发现”》^①提出中国“儿童本位论”观念的最初形成,是以周作人《儿童的文学》的发表为标志的,鲁迅等人的儿童观是进一步的补充。新文化运动中儿童被赋予特别的内涵,打破了传统落后儿童观的束缚,《新青年》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姚伟《儿童观及其时代性转换》^②对儿童观的形态、西方儿童观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儿童观时代转换的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其中提到人文主义、自然主义,以及杜威的“儿童本位论”对五四时期的儿童观产生了重要影响。陆克俭的《发现与解放——中国近代进步儿童观研究》^③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呈现的具体的儿童观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了近代儿童观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王黎君在《从晚清到“五四”——近现代报刊在中国现代儿童观生成中的作用》^④提出,“儿童本位论”的提

① 王浩. 新文化运动中的“儿童的发现”[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② 姚伟. 儿童观及其时代性转换[M]. 吉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③ 陆克俭. 发现与解放——中国近代进步儿童观研究[M]. 北京: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

④ 王黎君. 从晚清到“五四”——近现代报刊在中国现代儿童观生成中的作用[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出，离不开《新青年》，并且梳理《新青年》，可以整理出中国现代儿童观生成的线索。

有关儿童其他方面的研究，如儿童文学、儿童教育，学者都把“儿童的发现”作为儿童文学的出现或是展开儿童教育的一个重要佐证，认为当下的儿童观是五四基础上的再延续与再发展。任诗桐的《从作为“人”的儿童到作为“文学”的儿童文学》^①第一部分是“作为人的儿童”，由于传统因素儿童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新青年》中“人的文学”的口号登上历史舞台之日，儿童作为“人”则被发现。陆濛的《五四时期至四十年代中国儿童观的探寻》^②同样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儿童本位论”观念的出现与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息息相关，掀起了一股“儿童热”的潮流。王黎君的《儿童的发现与中国现代文学》^③从儿童视角、儿童形象、儿童文体与精神等方面论述了“儿童的发现”对现代儿童观的建构，现代儿童文学正是在发现儿童的基础上诞生的。杨文文的《二十世纪初中国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念发展进程》提出了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的出现是相互作用的，民国初年对儿童独立性的认识使现代型儿童文学观念的建构成为可能。

“儿童”究竟是“发明”还是“发现”，学界有过争论。杜传坤，吴其南等学者认为儿童是被“建构、发明”出来的，在传统社会，儿童本位是被忽略的，并且被意识形态干涉，比如“小国民”、“小英雄”等的称号，都是基于国家和社会而定。吴其南在《“礼”与中国儿童的身体建构》^④中明确提到了旧礼教对于儿童的建构，五四时期对于旧礼教的批判虽然并未一直进行下去，但提出了新的建构模式，这对儿童仍然是一种拯救。杜传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在《儿童文学想象儿童身份的教育学意义与可能》^⑤中，他认为儿童文学产生的基础不是儿童的出现，儿童文学是建构儿童的一种方式，成人通过儿童文学的书写来塑造符合自己期待的儿童，因此儿童是文化历史概念的建构物。而王泉根、朱自强等学者认为儿童是被“发现”的，对儿童的认识自古就有，只是在当时各

2004(02): 72-75.

① 任诗桐. 从作为“人”的儿童到作为“文学”的儿童文学[J]. 今日科苑, 2009(16): 151-53.

② 陆濛. 五四时期至四十年代中国儿童观的探寻[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③ 王黎君. 儿童的发现与中国现代文学[D]. 上海: 复旦大学, 2004.

④ 吴其南. “礼”与中国儿童的身体建构[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版), 2019, 23(01): 102-108.

⑤ 杜传坤. 儿童文学想象儿童身份的教育学意义与可能[J]. 当代教育学, 2015(16): 47-50.

种条件制约下，成人并未意识到。王泉根在《王泉根论儿童文学》^①中提到正是由于儿童被发现，儿童文学才产生并走向自觉的发展阶段，明确提出儿童是被“发现”。朱自强在《“儿童的发现”：周氏兄弟思想与文学的现代性》中谈到：“没有现代社会对“人”的发现作为前提，就不会有对“儿童”的发现”^②。而刘绪源结合了儿童的发现与建构，在《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一九一六——一九七七）》中的文章《“建构论”与“本质论”——一个事关文学史研究的理论问题》^③，他提倡在充分尊重人性和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将建构论与本质论相结合思考，才可能达到新的境界。随后，朱自强在《“本质论”与“建构论”的融合》^④中对刘绪源这篇文章中的文学史观进行分析，他提出刘绪源采用的是建构主义的本质论，他把儿童文学当作观念的建构物。潘纯琳在《“儿童”的发现与发明：作为文化概念的“儿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面形塑》^⑤中总结了两方观点，介绍了儿童概念的“本质论”和“建构论”方面的争论，最后提出无论儿童是“发现”还是“发明”，都行塑了中国现代文学，这就是从儿童出现的意义方面来进行研究，无论儿童是被“发现”还是“发明”，对儿童关注起来，这本身就是儿童地位提升最真实的表现。

这些文章与著作提出了一个共同的研究路径，就是鲁迅、周作人、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对“儿童的发现”所作出的贡献，尤其是他们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鲁迅《我们怎样做父亲》肯定新生生命的价值，并针对父母应该怎么做提出自己的意见，周作人《儿童的文学》强调儿童的人生权利，陈独秀的《一九一六》提倡个人应独立自主等，这些进步思想的提倡在一定程度上让整个社会意识到了儿童应有自己的独立人格。

二、对儿童教育理念的阐释

在知网以《新青年》为主要关键词，“教育”为次要关键词搜索，相关性较大的文章有八篇，内容包括对《新青年》整体呈现的教育问题进行概述，细化部

① 王泉根. 王泉根论儿童文学[M]. 广西: 接力出版社, 2008.

② 朱自强. “儿童的发现”：周氏兄弟思想与文学的现代性[J]. 中国文学研究, 2010(1): 99.

③ 刘绪源. 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一九一六——一九七七[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④ 朱自强. “本质论”与“建构论”的融合[J]. 东吴学术, 2014(6).

⑤ 潘纯琳. “儿童”的发现与发明：作为文化概念的“儿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面形塑[J]. 探索与批评, 2020(2): 84-105.

分提到儿童的教育，也有专门探讨儿童教育问题的文章。

涉及到儿童教育问题。葛培的《〈新青年〉中的教育问题研究》^①，谈到《新青年》中的职业主义教育与实利主义教育都与儿童息息相关。高方英的《〈新青年〉呈现的社会教育一瞥》^②关于儿童教育方面提到了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和《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这是科学的儿童教育在中国的萌芽。杨天平和黄宝春的《“五四”前期“新青年”反复古主义的教育方针》^③对《新青年》中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元培等人的反复古主义教育方针进行了概括，主张以民主共和为教育精神的旨归，这为提出新的儿童教育观奠定了基础。但这些文章只是在其中涉及到一些儿童教育方面的基础问题，并没有系统论述。

系统论述儿童教育问题。熊先翔的《论〈新青年〉对儿童教育问题的探讨及贡献》^④对《新青年》中的各类儿童教育主张进行了总结与分析，作者提到这些内容在探索的过程中，有创新的内容，也有偏激的理念，后人在继承的过程中应吸收合理部分。金妍的《〈新青年〉对儿童教育问题的探索》^⑤对《新青年》中的儿童教育观念、理论、方法和内容进行了概述。两篇文章都提出《新青年》中对于儿童教育问题的探讨，对构建儿童教育新系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人在继承的时候，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一个新颖的观点是杜传坤从教育学的角度，提出儿童文学具有发现与建构儿童身份的作用，在他的《儿童文学想象儿童身份的教育学意义与可能》^⑥中提到成人通过创作构建了成人想象中的儿童世界，这是一种主观观念的投射，是除却学校之外的另一种教育方式。在他的《现代性中的“儿童话语”——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谈起》^⑦中也提到了儿童是立法者的一种文化想象，是成人世界的“他者”。成人通过文学写作塑造儿童，以一定的教育目的进行指导，这是对儿童的一种意志强加，虽然“发现”了儿童，但也“遮蔽”了儿童。但无论是发现还是遮蔽，这对于传统儿童的地位都是一种颠

① 葛培. 《新青年》中的教育问题研究[D]. 苏州: 苏州大学, 2014.

② 高方英. 《新青年》呈现的社会教育一瞥[A]. 上海鲁迅纪念馆. 纪念《新青年》创刊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上海鲁迅纪念馆, 2015: 9.

③ 杨天平, 黄宝春. “五四”前期“新青年”反复古主义的教育方针思想[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35(06): 88-92.

④ 熊先翔. 论《新青年》对儿童教育问题的探讨及贡献[J]. 新闻前哨, 2020(12): 114-115.

⑤ 金妍. 《新青年》对儿童教育问题的探索[J]. 知与行, 2015(01): 155-159.

⑥ 杜传坤. 儿童文学想象儿童身份的教育学意义与可能[J]. 当代教育科学, 2015(16): 47-50.

⑦ 杜传坤. 现代性中的“儿童话语”——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谈起[J]. 学前教育研究, 2010(01): 16-21.

覆。

在介绍西方思想对中国儿童教育的影响方面，学者们总结了1915年杜威来华演讲对中国儿童教育事业产生的影响，对杜威的著作进行了翻译。著作方面如胡适翻译的《杜威五大讲演》^①、元青的《杜威与中国》^②、单中蕙、王凤玉编辑的《杜威在华教育演讲》^③等，对杜威的思想进行了翻译介绍。文章方面，郑刚，杨雁茹在《杜威来华与近代中国儿童教育的变革》^④中介绍了杜威对中国儿童教育进行了考察，剖析了中国儿童教育的问题，革新了中国儿童教育观念。赵康的《胡适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吸收和转化》^⑤谈到杜威对胡适的具体影响。访华前胡适对杜威思想已经有所接触与吸收，通过报刊大力宣传杜威的思想，访华期间更是翻译了杜威的演讲内容，并和自己的思想融会贯通会产生了新的观点。但邹红军和柳海民的《杜威“儿童中心”论在中国：历史回望、基本共识与遗留问题》^⑥中虽然也承认杜威思想的影响之大，但通过探索考察，他们发现虽然杜威的教育思想经过了大力宣传和普及，但并未成为教育学说的标榜，鲁迅发表在《新青年》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幼者本位”的观念，这与杜威的“儿童中心论”具有相通之处，但并未正式用杜威的“儿童中心”来表达。

既然谈到西方思想对于中国的影响，而这些思想是如何传入中国的，对于研究儿童话语也至关重要，学界也有对此的研究，并且内容主要集中于明清时期。除了上文提到了杜威来华讲学外，有一部分是通过来华办学传入的。肖朗的《〈童幼教育〉与明清之际西方儿童教育思想的导入》^⑦介绍了高一志编写的《童幼教育》，主要是通过开办耶稣会学校来完成对西方教育思想的传播。朱季康的《晚清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启蒙与自觉》^⑧中提到法国巴黎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教育机构，客观上为国人了解海外近代的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

① 胡适. 杜威五大讲演[M]. 安徽: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9.

② 元青. 杜威与中国[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③ 单中蕙, 王凤玉. 杜威在华教育演讲[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④ 郑刚, 杨雁茹. 杜威来华与近代中国儿童教育的变革[J]. 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0, 21(04): 47-53.

⑤ 赵康. 胡适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吸收和转化——以杜威访华时期为中心[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9, 17(02): 91.

⑥ 邹红军, 柳海民. 杜威“儿童中心”论在中国:历史回望、基本共识与遗留问题[J]. 教育学报, 2020, 16(04): 119-128.

⑦ 肖朗. 〈童幼教育〉与明清之际西方儿童教育思想的导入[J]. 浙江大学学报, 2020, 35(05): 85-93.

⑧ 朱季康. 晚清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启蒙与自觉[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2018, 43(03): 101-105.

三、儿童文学

关于书写儿童文学方面的著作与文章中，除了上文提到的将“儿童的发现”作为儿童文学出现的前提，还包括从整体意义上考察《新青年》对儿童文学发生的意义，将儿童文学运动置于整个新文化运动中来思考，对儿童文学的起源，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西方思想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影响，以及具体到安徒生童话的传播，周作人、鲁迅等人儿童文学思想的起源与发展等，内容广泛，涉及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儿童文学发展的方方面面。

关于儿童文学史的著作最早出现的是魏寿镛、周侯予编著的《儿童文学概论》，内容包括儿童文学的要素、来源等，已初具规模。当代的著作有韦苇的《世界儿童文学史》，蒋风、韩进的《中国儿童文学史》、蒋风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方卫平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王泉根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等，他们将 20 世纪的儿童文学进行了梳理。蒋风认为儿童文学这个名词是五四时期才出现，但是儿童文学是古已有之的，走过了一条从自发、觉醒到自觉的阶段，在他的多部儿童文学著作中都提到是五四文学革命催生了现代儿童文学。方卫平也认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作品是在五四前后才大量涌现的，周作人、鲁迅等人在儿童文学批评领域的著述涉及到了各个方面。王泉根从思潮发展的角度考察传统儿童文学，对五四时期儿童观的转变与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进行了论述。韦苇则是对外国儿童文学纵向与横向的发展进行比较，使人们对本国儿童文学所处的状况更加的清晰明了。

关于儿童文学是现代产生的还是古已有之的问题，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观点。朱自强认为儿童文学“古未有之”，儿童文学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观念，西方的资本主义与现代性传入中国，引导中国儿童文学的最初实践，在中国周作人是开创者。而王泉根和方卫平则认为儿童文学“古已有之”，其根源在于他们对儿童文学的定位有所不同。朱自强认为儿童文学是一种观念，它的出现应从这个词语的出现开始算起，而王泉根和方卫平则是将儿童文学作为一个实体部分来考察，他们认为古代的口头儿童文学等都算是儿童文学，因此不是近代才产生的。其他学者对儿童文学作品的判定条件也有自己的理解。周博文《“五四”：新文化、

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①作者提到不能因为文学作品中有儿童形象，就把它定义为儿童文学，因此鲁迅的《狂人日记》等以儿童形象承载社会问题的创作并不是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品。同样提出此观点的还有毕海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困境》^②，作者提出为“儿童”编写的读物在晚清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现代儿童文学已经发生，创作者遵循的仍旧是传统儿童观，只有意识到儿童是独立的个体，译作的儿童文学作品才是真正的为儿童。同时他提出独特的“童年创伤”记忆和体验，对鲁迅的思想人格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西方文化促使其开始对旧文化进行反思。

一部分学者将儿童文学置于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中进行思考，论述《新青年》对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与发展的意义，以及整个二十世纪初期儿童文学的发展状况。王黎君的《〈新青年〉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③，认为《新青年》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并且引领了其他刊物对儿童文学的讨论与关注，在理论方面重点对周作人《儿童的文学》的里程碑意义进行了论述，肯定了周作人的批评文章和童话翻译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作用，在作品方面重点介绍了陈衡哲的《小雨点》的艺术价值。作者的博士论文《儿童的发现与中国现代文学》^④赞赏了周作人《儿童的文学》对儿童生命的崇扬和精神品性的体认。博士后出站报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儿童视角研究》^⑤从儿童视角方面来研究儿童文学，谈到儿童视角的出现弥补了成人视角的单一性，儿童视角承载的都是独特而深刻的人生哲学思想和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朱自强的《论新文学运动中的儿童文学》^⑥中着重介绍了周作人的文学理念的“三级跳跃”，第一步是发现女子，第二步是《人的文学》中论述的儿童问题，第三步的《儿童的文学》宣告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诞生，并且周作人最早发现了文言表现与儿童精神水火相克，鲁迅提出了深刻的“现代主题”，即人的异化问题。周博文的《论儿童文学发生期文学创作中的儿童形象》^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借助《新青年》这个媒介，白

① 周博文. “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J]. 青海社会科学, 2015(04): 133-139.

② 毕海.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困境[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06): 172-179.

③ 王黎君. 《新青年》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0(05): 167-176.

④ 王黎君. 儿童的发现与中国现代文学[D]. 上海: 复旦大学, 2004.

⑤ 王黎君.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儿童视角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⑥ 朱自强. 论新文学运动中的儿童文学[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42(04): 116-121.

⑦ 周博文. 论儿童文学发生期文学创作中的儿童形象[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36(06): 114-118+146.

话文逐渐成为主潮，对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文学作品中的儿童形象成为成人作家批判社会的利器或是承载自己希望的容器。《狂人日记》承载的是改造国民性的批判，《小雨点》等则是作者寄予童年与儿童浪漫想象。

在理论方面，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吴翔宇提出的观点代表了儿童文学领域前沿观点，他的《思想资源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化建构》^①谈到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化既是实现“文学现代化”的手段，也是结果。五四时期的儿童观为儿童文学观念的构建提供了条件，思想上的为儿童和艺术上的去教化使儿童文学陷入了逻辑怪圈。对西方文学作品的译介和本土化文学作品的创作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向民族化与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他把儿童文学放在整个国家层面上考虑，提出了儿童文学对于“想象中国”的构建，这是基于儿童文学的一种新的考察视野。他的《边界、跨越与融通——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一体化”的发生学考察》^②从发生学的角度，提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具有“一体化”，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都从属于中国新文学的序列，推动了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的现代生成》^③中提到，国家的想象是通过语言文字产生的现象，引出了各种把“妇女”，“儿童”纳入国家的策略和方法，文学作品中的儿童形象重建了中国形象。《“五四”儿童文学“想象中国”话语构想的内在逻辑》^④从儿童文学的内部寻找“想象中国”这一话语的支撑点。《五四儿童文学想象中国的跨文化实践》^⑤则指出“想象中国”实质上是在五四儿童文学与西方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构建的一种现代性想象。《想象中国：五四儿童文学的局限与张力》^⑥提到儿童文学与政治是息息相关的，背负着特殊的时代使命。吴翔宇提出的研究新视野，揭示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把儿童文学的想象功能与政治联系起来，拓宽了研究的视界。

在具体译作方面，安徒生童话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一部分学者普遍认同安

① 吴翔宇. 思想资源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化建构[J]. 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0, 46(03): 127-136+203.

② 吴翔宇. 边界、跨越与融通——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一体化”的发生学考察[J]. 文学评论, 2020(01): 139-147.

③ 吴翔宇. 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的现代生成[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59(01): 24-32.

④ 吴翔宇. “五四”儿童文学“想象中国”话语构想的内在逻辑[J].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报, 2015, 28(05): 109-113+130.

⑤ 吴翔宇. 五四儿童文学想象中国的跨文化实践[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4(03): 61-66+72.

⑥ 吴翔宇. 想象中国：五四儿童文学的局限与张力[J]. 文艺争鸣, 2013(11): 27-33.

徒生童话在中国的传播与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随感录二十四》以及后期周作人用白话文翻译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密切相关。周秀英《〈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国传播史研究》^①从传播学方向，详细梳理了《卖火柴的小女孩》进入中国后的传播情况，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侧重点及背后的深层根源，提到周作人的译作起到了示范的作用。潘白鸽的《儿童启蒙思想的推进和五四儿童文学翻译热的发生》^②提出《新青年》引领了五四儿童文学翻译热，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首批进行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的人，也是使安徒生在中国传播开来的人，拉开了五四儿童文学翻译热的大幕。张道振的《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翻译思想》^③中提到周作人翻译的《卖火柴的女儿》以及对安徒生的关注，推动了安徒生作品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周作人将翻译的功利性与艺术性结合，这是他发现儿童的一种途径。他们从各个学科角度肯定了周作人对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对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有学者提出不一样的观点，叶隽的《安徒生童话该怎样翻译》^④也主要探讨了周作人用白话文翻译安徒生童话的价值，但作者提出了不应彻底否定《十之九》译本。

周作人和鲁迅在儿童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二者的儿童文学观也受到了学者的重视。韦宏的《周作人儿童文学观论略》中给了周作人很高的评价，在儿童的发现上，“在西方，如果说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是卢梭的话，在中国即为周作人”^⑤，他的《人的文学》《儿童的文学》等对于儿童的认识是质的飞跃，但作者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即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局限性。因为受杜威“儿童本位论”的影响，周作人在创作中片面强调儿童的自然属性，忽视儿童的社会属性，导致他的儿童文学观把儿童看做理想的人，否认儿童的社会性。章景风的《周作人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⑥，周作人受到日本高岛平三郎的影响关注儿童文学，并且是最早发现儿童，才有后面的儿童文学。他的儿童本位观的提出和译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开启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时期。朱自强

① 周秀英. 《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国传播史研究[D].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 2014.

② 潘白鸽. 儿童启蒙思想的推进和五四儿童文学翻译热的发生[D]. 金华: 浙江师范大学, 2009.

③ 张道振. 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翻译思想[J]. 安阳工学院学报, 2006(03): 121-123.

④ 叶隽. 安徒生童话该怎样翻译?——以周作人批评、叶圣陶创作与叶君健翻译为中心[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40(01): 60-72.

⑤ 韦宏. 周作人儿童文学观论略[J]. 北方论丛, 2011(04): 44.

⑥ 章景风. 周作人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3, 32(01): 79-82.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念的发生——以日本为中心》^①，提到周作人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都受到了日本文学的影响，“儿童本位”、“儿童文学”这两个词语都是直接借用了日语，还受到了日本的小说随笔的影响。滕紫欣《浅谈周作人的文学批评观》^②总结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他在继承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吸取西方新思想，从“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的批评观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观念。他的《人的文学》首次对新文学的理念进行了阐释。韩诚的《人的文学、儿童的文学和诗歌直译》^③主要介绍了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文学观念，他在《新青年》的译作中延续了对弱者的关注和同情，首次用白话文翻译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在此基础上，他的《儿童的文学》中提出了“儿童的文学”的概念，重在为儿童赋予“人”的社会地位，将儿童文学的标准定义为“符合儿童需要的文学作品”。吕佳蒙的《一个动态的过程——试论中国儿童文学的起源和定型》^④，作者认为儿童文学的起源走过了从“自发”到“觉醒”再到“自觉”并最终在五四时期定型，周作人《儿童的文学》的演讲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向自觉的宣言书。周博文《“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⑤中提到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反对封建思想，用新的价值体系关照生命。蒋雁虹《从“幼者本位”到“成人童话”——略论鲁迅的启蒙主义儿童文学观》^⑥介绍了鲁迅的儿童文学观，五四文学革命是他对儿童教育启蒙的切入点，主要以“立人”为目标。对于周作人和鲁迅儿童文学观的论述，对于研究儿童文学观的现代性构建至关重要。

以上对《新青年》中儿童观以及儿童教育与文学的研究无疑提供了诸多思考和借鉴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目前这些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对于《新青年》中儿童问题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对《新青年》中关于儿童某一部分的涉及，比如单独的儿童文学，教育问题，儿童观等，或是在探讨其他问

① 朱自强.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念的发生——以日本影响为中心[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7(06): 72-78.

② 滕紫欣. 浅谈周作人的文学批评观[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6(09): 118-120.

③ 韩诚. 人的文学、儿童的文学和诗歌直译——《新青年》中周作人译作与其文学观念的形成[J]. 科学经济社会, 2016, 34(02): 106-110.

④ 吕佳蒙. 一个动态的过程——试论中国儿童文学的起源和定型[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16, 32(12):152-153.

⑤ 周博文. “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J]. 青海社会科学, 2015(04): 133-139.

⑥ 蒋雁虹. 从“幼者本位”到“成人童话”——略论鲁迅的启蒙主义儿童文学观[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6(02): 117-121.

题时对儿童方面进行了一小部分的提及，并未将《新青年》中的所有关于儿童的内容进行系统论述。其次大多数文章集中于鲁迅、周作人等人的贡献，虽然他们对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可否认，但也应注意到《新青年》中也有其他学者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应全面总结探讨，比如陈独秀所提出的关于翻译的意见等，都值得我们关注。《新青年》作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杂志之一，它对于儿童问题的探讨，对于现代儿童的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它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还需要进一步的总结与论述。

第三节 研究意义与方法

从20世纪初提倡儿童的独立与解放到现在，儿童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并不意味着儿童已经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或者说完全实现了解放。五四时期是儿童从被发现到独立的重要时期，特别从《新青年》开始了“儿童的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新青年》中儿童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对于当代儿童观的建构还是对儿童发展的研究都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并且要真正研究历史中的儿童问题，必须以史料为依据，去考察当时社会的历史原貌。并且《新青年》的历史地位是无与伦比的，是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史了，研究《新青年》中的儿童问题既可以真实还原方式当时社会对儿童的看法，又可以为当今社会的儿童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

本论文拟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

1、文本细读法：从儿童入手，细读《新青年》，力图将《新青年》涉及到所有与儿童有关的内容截取出来，以《新青年》为主要研究对象，加以研究民国时期其他史料，回到历史当中，从细节处探寻《新青年》中的儿童。

2、文献研究法：通过中国知网、读秀、校图书馆馆藏图书等方式，获得有关《新青年》儿童话语的文献资料，并吸取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精华。

第一章 儿童的发现

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解放、心灵觉醒的启蒙时期，“人的发现”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人的发现”唤起了“儿童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同时深化了“人的发现”。《新青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宣传解放思想的主要阵地，扮演着儿童解放的“宣传者”与“引领者”的角色，在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要求下，对儿童的研究提上日程，从“人的发现”开始，到“儿童的发现”，两大相互关联的思想推动儿童的社会地位直线上升。

第一节 儿童作为“人”的被发现

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被称作“人”，是因为人具有高度发达的大脑，有复杂的意识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从逻辑上来说，“人的发现”与“儿童的发现”，二者之间相互关联，“人的发现”必然会唤起“儿童的发现”，没有“儿童的发现”，“人的发现”难以走向深入或最终完成。儿童作为人一生中十分重要的阶段，它的发现对于人类自我的发现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想完成“儿童的发现”，首先要从“人的发现”开始。

“人的发现”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这里的“发现”，并不是出现的意思，而是人开始追求独立，开始正视作为“人”的权利。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提倡人权与个性自由，布克哈特说过，“文艺复兴除了发现外部世界之外，由于它首先认识和揭示了丰满完整的人性而取得了一项尤为伟大的成就”^①，包括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都加快了人解放的进程。而在近代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开始了觉醒的历程，人的个体自由意志和意识逐渐出现。

中西方在经济、政治、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国体现为集体主义，而西方则注重个人主义，强调个性发展，二者具有互补性，因此向西方学习是“人的发现”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步。《新青年》中有很多文章是介绍西方的个人主义的，通过对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介绍，启动

^① 布克哈特.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 何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425.

了《新青年》对于“人的发现”的挖掘。陈独秀在创刊号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一文中指出推动国家进步的三件法宝：“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故之道而使人新社会焕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①，介绍了法国的人权历史，从《人权宣言》后，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切平等，至此，公平开始成立。在这一号的结尾还提到了日耳曼民族的个人主义，即富于独立自主之心。西方的个人自由主义从传入中国后，就得到了中国的青睐，中国化后成为强调人的自由独立之精神的重要法宝，并且被当做批判封建家族主义的武器，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对于“人的发现”是思想上的跨越，只有先承认人是自由且独立这一事实的存在，才有后面的一切，思想上的进步，是成功改革的开始。

学者们对于中国自身存在的人权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中“发现人”，以达到从思想上开导世人的目的。高一涵在《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中对传统人权理念进行了批评，他提到传统社会中的国民大多没有权利且被奴隶，人权完全被剥夺，更别说是儿童，基本是属于附属地位。他还连续发表了《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发出“吾辈青年责任，在发扬立国之精神”^②的号召，提出青年乃至所有人要通过个人的独立自重精神，发扬小己之努力，与旧习俗相战，从侧面突出了旧习俗对于人性的压迫，强调“人的发现”势在必行，包括他的《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等都从不同方面提出了事物即具体到每一个人的生长都要因其自然，不能因为国家至上就牺牲人民的自我，不能忽视甚至掠夺人民的权利。陈独秀在《一九一六》中，提出男女青年应通过奋斗独立起来，脱离作为国家和社会附属品的身份，要有自己的诉求；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被傅斯年称为是“文学革命的宣言书”，同时它也是个性解放最有力的宣言书，胡适认为“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却偏说一点病都没有！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③，因为社会在长久的发展中，很多习惯都是约定俗成的，大家对于不道德的事情也习惯了，或者说麻木了，既然无力改变不如去接受，但最终都要认清现实：社会的罪恶是我们共同造成的，人人都是参与者，只有认识到旧社会的病症，才能对症下药。

① 陈独秀. 敬告青年[J]. 新青年, 1915, 01(01).

② 高一涵.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J]. 新青年, 1915, 01(08).

③ 胡适. 易卜生主义[J]. 新青年, 1915, 04(06).

同时他指出：“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①，并且强调个人必须要充分注重自己的个性发展，要有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还有众多知识分子，如鲁迅等，都从不同的方面证实了发现“人”的重要性，并为此作出了极大的努力。马克思曾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②。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将人“物化”，将国家视为偶像，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新青年》，专扫除旧式的偶像，这是“人的发现”的起点，此后才得到重视，开始新的发展。

新式知识分子是中国“人的发现”的坚实后盾，他们大多有留学经历，有着比普通人更多的世界知识，民族危机感和爱国心更加热烈，不断地为国家的未来思考，在他们的努力下，“人的发现”、个人主体性的张扬，成为这个时代任重道远的价值目标。即使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带着强烈的民族自卑，但在那个国破家残的年代里，仍然表达出了对于民族自信的渴望，渴望人民站起来，向往人格与尊严，这对“人的发现”在理论层面无疑开了一个好头。《新青年》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阵地，极大地促进了人的解放，“发现人成为了五四历史发展的逻辑起点”^③。但在实际中，要想个人独立精神有所发展，除了国家要有一个好的导向外，也需个人要有负责任的精神，人的尊严与价值对于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息息相通的。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人的发现”对于“儿童的发现”是一个好的开始，只有真正认识到人作为“人”的重要性，首先把“人当做人来看待”，才能逐步唤起“儿童的发现”，引导成人重新认识儿童。

第二节 儿童作为“儿童”的被重视

“儿童”这个名词并不是中国自古有之的，在传统社会中，它并不是一个生理或是关于年龄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文化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的变化和人们对此身份的期待而变化。在中国，对于儿童的认识一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变迁而变化，在儒家思想盛行时期，“父为子纲”的观念深入人心，孩子必须绝对服从于父亲，即使同时要求父为子做出表率，但是在社会盛行的文

^① 胡适. 易卜生主义[J]. 新青年, 1915, 04(06).

^②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1843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414.

^③ 毛自鹏. 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7.

化心理中也是“祖先崇拜”与“老者本位”的观念占据上风，虽然这有助于当时的封建秩序，但明显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晚清时期由于民族危机爆发了救亡图存的社会启蒙运动，儿童作为国家与民族的希望被提出，被重视，作为独立的群体开始浮出水面。梁启超将儿童与国家发展的未来相提并论，他提出：“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①，赋予了儿童新的意义，对传统社会中的儿童观已经是一种颠覆，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儿童仍然是国家和社会的附庸，它总是被其他的词语来形容，比如“具体而微的成人”、“小人”以及直到现在的“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等，缺乏对儿童本质和个性的认识；五四时期才开始真正重视儿童的本性，儿童作为完整的人被重新认识。在“人的发现”的过程中，逐渐延伸到人生发展的各个阶段，“儿童的发现”也被郑重地提上日程，《新青年》仍旧是儿童被重视的重要场所。

“儿童的发现”不管是从生理还是心理来看，它是早就存在的，当被作为“人”的身份提出时，“儿童的发现”便随之而来，无论是向西方学习，还是从本国自身寻求发展路径，学者们做出的成果都是毋庸置疑的。《新青年》创刊号的译文《青年论》，将儿童的重要性直接的表达了出来，“儿童者成人之根基也”^②。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提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③，明确表达了在人的一生中，少年时代最为重要，而反观东洋民族，在封建社会中宗法为主要制度，以家族为本位，个人无权利，更何况是儿童，这给了五四学者很大的启示。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时期也”^④，将青年阶段对于人生的重要作用做出了简单论述，并针对青年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等六点要求，从理论层面提出了人有自主之权，有独立平等之人格。少年是青年的前一阶段，即使真正的“儿童”在晚清依然属于沉睡的状态，但“少年”、“青年”的词汇已经开始频繁出现，晚清时期梁启超等人勇于提出少年的地位应在老者之上，这对于“五四时期彻底

① 陈书良. 梁启超文集[M]. 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09: 56.

② 一青年. 青年论[J]. 新青年, 1915, 01(01).

③ 陈独秀.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J]. 新青年, 1915, 01(04).

④ 陈独秀. 敬告青年[J]. 新青年, 1915, 01(01).

否定旧道德，旧伦理，发展进步的儿童观念做了先行尝试”^①，对于陈独秀等人也给予了很大的启示，因此对于青年的要求，同样隐含着对于少年儿童的要求。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重视礼和伦理，但当“礼”被当作国家统治人民的工具时，社会就会被笼罩在一种无形的道德约束力下，在家庭中总是无视儿童的独立人格。《新青年》的“随感录”栏目为学者们讨论儿童问题提供了一片新天地。鲁迅在《随感录二十五》中提到：“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②。最后他提出在中国更多的是成年男性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做孩子的父亲，所以以后要是“人”之父。在这里，鲁迅明确地提出了要把儿童当做“人”来看待，对于现实的无能为力转化成对儿童以后生活的期许与厚望，儿童首次被“看见”，被“发现”，被“重视”，虽然这样沉重的历史任务被寄予在成年父母身上，但对于长期遭受成人压制的儿童来说，已然是向光明走近了一大步，这就是存在的意义。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将“旧账如何购销”^③寄希望于“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④，并明确提出了将来是子孙的时代。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提出：“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④。他将传统儿童的地位进行了理性分析，认为传统社会儿童是归父母所有，由父母支配，“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④，家庭与社会造成了儿童的悲剧，而自从福禄贝尔与王德温夫人以后，才有光明出现，由此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儿童发现的重要性。中国涉及到这类问题，需要思想根源彻底改变，人的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成人对孩子的权威态度与管教方式自古盛行，将儿童的天性压抑到了极致，很多孩子尤其男孩的作用是为了传宗接代，也成为了巩固女性地位的工具。周作人义正辞严地指出了这个问题，并呼吁要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人道主义，也为后期儿童文学的发生奠定了基础。张耀翔的《论吾国父母之专横》中谈到，我国父母把儿童据为私人财产，甚至是奴隶，

① 周博文. “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J]. 青海社会科学, 2015(04): 133-139.

② 鲁迅. 随感录二十五[J]. 新青年, 1918, 05(03).

③ 鲁迅. 随感录四十[J]. 新青年, 1918, 06(01).

④ 周作人. 人的文学[J]. 新青年, 1918, 05(06).

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语要挟儿女，只要有利于父母之事，儿女须牺牲一切。这些文章通过批判传统家庭制度，呼吁儿童的生存环境应当有所改善，儿童应被重视起来，也许并没有提出太多实质性的应对策略，但仍为警醒后人做出了理论上的贡献。

《新青年》从正面阐述传统社会中儿童是没有地位的，天性也被父母压制。鲁迅把儿童问题和妇女问题放在一起，更加证明儿童是弱势群体，是同妇女一样要与男权社会对抗的群体。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新思潮的意义就在于研究问题，将外来的文化与本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再造文明，一切旧文明的存在价值将被重新评估。儿童的存在自古有之，只是在长时间的国家与成人压制中，并未很好的发展起来，所以不能说是旧事，只能说以前的“非人儿童”是错误的，而从五四时期开始，儿童以全新的面貌出现，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不再作为“成人的附庸”，或是家庭的奴隶，一切都将有新的曙光。

第三节 《新青年》之于“儿童发现”的意义

从 20 世纪初提倡儿童的独立与解放至今，儿童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五四时期是儿童从被发现到独立的重要时期，特别从《新青年》开始了“儿童的发现”。《新青年》的历史地位是无与伦比的，研究《新青年》对于“儿童的发现”，既可以真实还原当时社会对儿童的看法，又可以为当今社会儿童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基本阵地，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 20 世纪掀起的儿童热潮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具有留学经历，接受了西方科学与民主的进步思想，回国后又积极地宣传，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来关注儿童的生活与地位，思考与儿童有关的问题，以及译作儿童文学作品，他们将自己超前的意识化为一篇篇发人深省的文章，敲醒了人们儿童领域沉睡的板块，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股“儿童热”，直接引领儿童思想解放潮流，引导着中国现代儿童观的发展、文学和革命的发展与价值取向，具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思想，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①的时代，儿童的解放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传统社会中的儿童基

① 高园园. “五四”儿童文学理论与实践研究[D]. 太原: 山西大学, 2021.

本是没有地位的，他们附属于社会，附属于家庭，他们源自家庭，最终融入到社会中，但成人没有意识到儿童是有自己独立意识的，他们有自己的权利，也渴望获得尊严，有自己的欲望，不仅仅是只属于社会属于民族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引出了关于“生”与“欲”的讨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①，他认为欲望是生活的本质。但儿童拥有尊严、欲望、权利的前提，是社会首先承认儿童是一个完整的人，只有将他们当作人来看待，后续的权利才有可能实现。《新青年》唤起了“人的觉醒”，从而唤起了“儿童的发现”，成人开始将儿童当成个体，开始尊重儿童的权利，维护儿童的权益，无论是被当做祖国的未来还是“小大人”，之前作为弱势群体的儿童地位正在不断地提高。

《新青年》的出现，重构了传统儿童观。“人的发现”是《新青年》对思想解放的最大贡献，“儿童”的发现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作为启迪民智的一个方法，《新青年》大量译介了西方的作品，介绍了西方具有进步意义的儿童观，转化为本国所用，虽“远求异文”之法不能与本土文化资源相提并重，但补其缺少，庶为富足的功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些知识分子本身就有留学的经历，比如在日本留学的周作人，美国留学的胡适，有近距离接触到西方文化的条件，再加上杜威等人来华讲学，双向的促进了中国儿童观的进步。具体则体现为对儿童教育理念的重新阐释，对儿童生存境况以及儿童精神发展的关注，使得儿童在被“发现”的基础上，发展的更为全面，从而深化“儿童的发现”。

在儿童教育方面，《新青年》引进了西方教育理念，译介了杜威等人的“儿童中心主义”，以及西方对于少年体质的培养，但绝不是“拿来主义”，而是根据我国的现实状况进行转化吸收，形成了适用于中国现状的新的儿童观。学者们提出以儿童本能为出发点进行教育，陈独秀提出要最大限度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社会应助力儿童独立人格的产生，对学校内部儿童教育的具体问题也都有所涉及，强调的启发式学习、美育、儿童公育等思想在今天看来也是儿童发展方面一个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在儿童生存环境方面，批判了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传统社会中儿童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儿童被成人看作一种传宗接代、养子防老、光宗耀祖的工具，连独立的身份都没有，更别说受到法律的保护了，几乎没什么地位。而五四时期，这一切开始有了大的改变，《新青年》发挥了引领的作用。刘

^①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2.

舒雅、高一涵等人集中于对西方自由主义与独立精神的译介，对传统孔道观念的批判指责，从思想根源处进行改头换面；张耀翔的《论吾国父母之专横》、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分别从家庭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两方面提供了诚恳的建议，提倡“幼者本位”，具有极强的现实性与针对性。《新青年》使成人意识到只有从国家层面和家庭层面认识到儿童的自主权利并从自身做起，儿童才能够全身心的健康发展，全新的思想冲击了几千年来以儒家传统为核心的旧儿童观，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国家社会对于儿童的强制性期待，给予儿童自由发展的机会。

在儿童精神发展方面，主要体现在对儿童文学的倡导以及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作，促进了儿童精神的发展以及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为孩子’的儿童本位思想的确立，使人们开始思考儿童精神生活的需要”^①，从而出现了“为儿童”的文学，从理论到实践，《新青年》都是儿童文学发展的当之无愧的引领者。

《新青年》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他对有关儿童的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观念，无论是倡导儿童文学的原因，还是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儿童文学作品应有的变化等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从理论方面表现出了对儿童精神品性的体认。当然，前提是他《人的文学》定义了要以人道主义为本，迁移到儿童身上，即作为弱势群体的儿童开始被“发现”，开始有自己在文学方面的需求。周作人、鲁迅等人致力于儿童文学的译作，共同推动了儿童文学创作和翻译的蓬勃发展。

总体上来说，《新青年》大致勾勒了现代儿童观在萌芽时期的发展轨迹：儿童作为独立的人被发现，传统落后的儿童观被颠覆，人们开始认识到要根据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来教育儿童，认识到儿童精神方面的需求，译作儿童文学作品，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的蓬勃发展。

^① 丁少钿. 论《新青年》中儿童文学观念现代性的发生[J]. 时代文学(下半月), 2012(01): 211-213.

第二章 对传统儿童观的重新建构

儿童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儿童观的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儿童观的发展也呈现出了曲线式的进程。传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对于儿童的教育还处于与生活 and 劳动结合的状态中，完全处于不被重视的状态，“奴隶式”的教育居多，随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成人开始重视儿童，但儿童本身仍然没有权利，一切都要听从国家或父母的安排，造就符合他们期待的儿童样式；近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逐渐在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与时俱进的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新青年》的出现，对于引领儿童思想解放潮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传统儿童观进行了重新建构，儿童不再是成人的附庸，不再是国家的奴隶，而是独立的个体，开始有适合自己的教育模式，生存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精神需求也逐渐得到了满足，是该时期儿童解放的重要成果。

第一节 教育理念的重新阐释

中国儿童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的教育形式为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早在原始社会已经出现，主要场所为家庭，父母的榜样作用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到了封建社会时期，教育制度与机构日益完善，政府官学与民间私学开始兴起；晚清时期的儿童教育更是蓬勃发展，清政府推进新式教育，改设小学堂，推广学堂办法，当时报纸是作为一种宣传政治主张的工具，比如《东方杂志》就是以立宪派的立场为政府宣传教育主张。历史经验表明要想提升儿童的地位，提升儿童的综合素质，必须从教育出发，五四时期儿童教育的发展上了一个台阶，从儿童自身的特点出发对学校教育提出要求，对儿童自身发展也提出了要求。《新青年》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通过对西方教育理念的学习，对传统儿童教育观的批评，对儿童教育理念进行重新修正阐释，力求提出新的主张，注重儿童教育的适用性与发展的全面性。

一、西方教育理念的引进

五四运动爆发前期，在胡适、陶履恭等人的盛情邀请下，美国实用主义教育

家杜威来华讲学，在当时影响很大，“儿童本位论”是核心内容，主要内容包括应注重儿童本能的教育，使儿童成为改良社会的预备，扩充推广儿童的环境，从家庭很小的环境到更大的社会环境，提出了“在整个教育中，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①的命题，认为教育必须切实的为儿童考虑，以儿童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去思考。他的观点一反传统社会中儿童无权利无自由的现实，冲击了中国几千年“父为子纲”为核心的旧儿童观，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国家社会对儿童的强制性期待，给予儿童自由发展的机会，尽管仍然是为了国家培养儿童，至少在意图上，是为了儿童的独立而提出的，即使现在，我们都将永远无法摆脱自己的社会属性，更何况当时连最基本的权力都没有的儿童呢？因此，杜威的讲学在当时引起了新文化运动参与者的极大注意，《新青年》中对西方教育理念的译介也主要集中在杜威，从七卷一号到四号记载了杜威在北京和上海的演讲，知识分子开始了对西方理论的挖掘以及与中国现实的结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胡适师从杜威，崇拜杜威，在他的《我的信仰》中写道：“杜威给了我们一种思想的哲学，以思想为一种艺术，为一种技术”^②，杜威对于他的一生影响很大。《实验主义》就是胡适在杜威到中国讲学前一个月后发表的，介绍了杜威的实验主义，他认为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环境变了，真理也会随之改变，这启示对儿童的教育不能沿袭传统的教育方法，要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创新，创造出以儿童成长变化为基础的教育方法。

陈独秀对推动儿童教育理念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造就一代心理和生理都健全的新青年和新国民。在杜威来华讲学之后，陈独秀立即抓住这一点，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通过对比中西差异，对传统社会的儿童教育理念提出了批判。他提出“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③，这就解释了为何在中国儿童是父母的“奴隶”，他们的生存权利被掌握在了家庭与社会的手中。对儿童的教育也是如此，传统社会三纲五常的思想根深蒂固，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方面，制约着成人对子女的教育观，同时，这种较为稳定的观念又在下一代身上得以再生，所以说“社会的文化传统

① 赵祥，王承绪. 杜威教育论著选[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 3.

② 胡明. 胡适选集[M]. 天津: 人民出版社, 1991: 20.

③ 陈独秀.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J]. 新青年, 1915, 01(04).

总是与教育大致保持着相互适应的耦合状态”^①。所以西方的“放养式”教育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与中国社会有必然的适应性。要想让儿童从家庭的桎梏中脱离出来，首先要把儿童放到社会中去，让他们与家庭产生一定的距离，才有助于儿童独立人格的产生，否则在成人自我中心主义的遮蔽下，儿童将永远处于从属地位。

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新思想的提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也在不断深化，《新青年》上刊登了大量西方的教育理念与方法。谢鸿的《英国少年团》，李穆译的《英国少年团规律》，澍生译的《巡视美国少年团记》，李次山的《少年共和国》等，介绍了各国少年团的缘起与发展，从义务与权力两方面介绍了少年团的组织纪律与现代性，提出我国青少年的革新应首先从“身体革新”开始。少年团缘起英国，后发展到各国，是出于战争需要从少年时期开始培养具有现代要求的国民精神者，他们自成一体，纪律严明，体现出了国民所需的勇气、耐性、智略等，是一个小的共和国，秩序井然，足以证明少年能作与成年人同等之事业。传到中国以后，1913年中国在上海创办了童子军部队，康普的《中国童子军》以及关于童子军会的报告，介绍了中国童子军部队的发展状况，主要目的使“青少年诚实有用，思想言行清洁”^②，使青少年的身心教育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顺应了19世纪提出的“实证主义”及教育思潮，对儿童各种活动的展开都做好了准备工作，培养他们生产生活的技能。抛开其政治色彩，《新青年》对童子军部队的介绍，对于中国尤其是少年儿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对西方少年团的介绍，引起国内对儿童身心修养、道德品质的关注，促使社会各界开始关注儿童的身心健康，尤其是其身心教育，确保他们全面健康地成长。同时提醒社会，少年儿童肩负祖国发展的重任，是社会革新的主要后继者，应该谨防被“陈腐朽败”的传统社会所同化的危机。

二、具体问题的讨论

对学校儿童教育的具体问题，《新青年》都有所涉及，从强调启发式学习、

^① 卜玉华. 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取向与儿童教育观[J]. 江西教育科研, 1995(04): 10.

^② 康普. 中国童子军[J]. 新青年, 1916, 02(05).

学生的全面发展、美育，到学校内部的教育改革，都进行了具体的论述，这为以后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蔡元培首先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他认为“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①。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在当时孔教文化盛行的情况下，蔡元培提出这样一个先进的观点，对儿童教育的发展无疑是巨大的进步，直到今天，国家依然在强调美育的重要性，提出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沈兼士发表了《儿童公育》，他认为“家族制度重要之元素，实为儿女”^②，而如何处置儿童对于妇女解放也至关重要，所以儿童公育势在必行。他从儿童公育的组织、经费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设想，总结了实行儿童公育对儿童的好处，可以预防父母对于儿童的溺爱，扫除传统对祖先的崇拜，使儿童具有独立的精神，同时对于国家与社会发展进步都有一定的好处。《儿童公育》一经发表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围绕此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很快一股倡导建立儿童公育机构的思想风起云涌。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在通信栏杨钟健从具体实践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否适合实行儿童公育？母子之间的天然关系怎么能马上打消？他赞同实行儿童公育的理由，但他认为儿童公育应是妇女与家庭等问题解决后的成绩，“是革新运动的唯一产物，唯一成绩”^③，而不是问题解决的前提。因此，虽然儿童公育提倡把对儿童的教育委任于公立机构有违常情，但是它的提出挑战了父母在儿童教育中的主导地位，“仍然潜移默化的改变了人们关于儿童的本质及其归属问题”^④，这对于传统观念中家庭把孩子当做工具的落后思想是一个巨大的改变。陈独秀同样赞同“美育”的观点，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他明确表态：“新文化运动莫忘了美育”^⑤，可见“美育”的理念在当时的先进之处，受到了广大学者的普遍认同。后来在1937年的《中央公报》也发表了《儿童公育之我见》中提出儿童公育“更可以培养出健全的国民，而造成建强的民族”^⑥，这便是儿童公育的最终目标。

对于小学教育的改革，学者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归国杂感》是胡适在

① 蔡元培. 以美育代宗教说[J]. 新青年, 1916, 03(06).

② 沈兼士. 儿童公育[J]. 新青年, 1918, 06(06).

③ 杨钟健. 儿童公育[J]. 新青年, 1920, 08(01).

④ 赵妍杰. 不独子其子-五四前后关于儿童公育的争论[J]. 社会科学研究, 2015(05): 186-193.

⑤ 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J]. 新青年, 1920, 07(05).

⑥ 李伟博. 浅议清末民初时期的儿童公育思潮[J]. 知识经济, 2009: 172.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796232202140010044>